

北京大学教授  
鲁迅研究专家

钱理群：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过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无法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更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生者和死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修订版】

# 经历

## 我的1957年

和风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封底：

写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无法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无法遗忘，我们想请求你们必须和他——生者和死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修订版〕

# 经历

## 我的1957年

和风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 / 和风鸣 著. —兰州: 敦煌  
文艺出版社  
ISBN 7-80587-568-5

I. 经... II. 和... III. 和风鸣-自传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88703号

## 书 名 经历——我的 1957 年

---

作 者 和风鸣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封面设计 印象迪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 址 www.dhwycbs.com E-mail gy@dhwycbs.com  
邮购电话 (0931) 8773235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8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8,000  
书 号 ISBN 7-80587-568-5  
定 价 29.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钱理群





## 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 ——“1957年学”研究笔记之二(代序)

○钱理群

### 一、命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18~19页）<sup>①</sup>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关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有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92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

<sup>①</sup>文中引文所标注页码全部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经历——我的1957年》。



2005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莅兰讲学时与和凤鸣交流

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

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1986年10月18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油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



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原’，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兴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 二、隔离

在和凤鸣的记忆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当被宣布为右派，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远离而去；“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经历》，21页），这来自朋友、同志，有时更有亲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正是当年“狂人”的感受：这死鱼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从顶上直冷到脚跟”！正像当年以“疯子”的罪名将反叛者逐出社会之外一样，现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将革命者逐出了。

处在社会隔离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凤鸣和她的丈夫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经历》，24页）。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经历》，21页）。但应该说，和凤鸣和王景超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仍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却或因社会压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乱，竟出现了夫妻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揭发私房话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最后地堵塞了人赖以躲避外在风浪的精神退路，在历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这最后的绝望中走向绝路的。因此，我说过，把革命引入家庭，将精神控制伸向床第，强迫或诱使夫妻与骨肉相互划清界限，这是最无人道的，因为它逼迫人越过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

对于和凤鸣与王景超这样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则要强制他们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经历》33页），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和凤鸣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零花。……”和凤鸣“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她突然明白：“惟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心颤不已”。（《经历》，64，67，65页）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王景超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己最后的精神防线。如今这已成了和凤鸣永远的记忆：“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经历》，24页）；到了劳改农场，他也还在写，并且劝难友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在写，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王景超们身陷地狱以后，惟一能够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但正如一位远比王景超现实、冷峻的难友所说，这是“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训斥：“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经历》，509页）而听了他的劝告也在记日记的难友，更是被同在罹难的右派“无限上纲”：“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经历》，145页）尽管王景超冒着危险，奇迹般地写下了两本日记，作为生命的最后遗物留给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难逃的和凤鸣，仍将这些日记连同他写的小说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烟飞灰灭，全部消灭”（《经历》，450页）。——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灭”。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营时，都谈到了单独监禁的可怕：那是将人置于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间里，杜绝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绝对孤独的状态。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





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国的监狱自然少不了这样的被茨威格称为“阴险”的单独囚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创造，即精神的隔绝：从表面看，你还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甚至是在一个相当拥挤的生存空间里，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难友朝夕相处，经常有身体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却是绝对隔离的。和凤鸣曾一度被安排在场部财务科协助工作，财务科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所，场部的人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和凤鸣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她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她，仿佛她并不存在。（《经历》，246页）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凤鸣这样描述她内心的感受：“如果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历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经历》，255页）与同一处境的难友之间的交流，也无可能；甚至，这样的交流是危险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凤鸣就是因为给一个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张小纸条，对方反戈一击，才横加“订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后家破人亡的。而当她忍受不住被周围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极其谨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泄时，竟立刻被打了“小报告”，又获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经历》，256页）。受害人之间的这类相互伤害，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发检举，就会被检举揭发，这样的人人自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很容易越过道德的底线：保护自己成了惟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伤害了他人，也似乎顾不上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狼与狼的关系。这样，尽管仍处于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显在或潜在危险的不可交流的对象，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的存在，“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这样的人群中的绝对隔绝与绝对孤独感，是真正令人恐惧的。

这是和凤鸣的回忆里，最不忍卒读的一页：当被派去“医院”烧炕时，她看见的是：所有的人“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见了我，但全像没有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相互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经历》，342页）——人本是社会的存在，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现在却用“革命”的名义，将右派从整个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成为一无依傍的绝对的孤独的存在，而且被



剥夺了情感倾诉、思想交流、言语自由表达的一切对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与可能。长期的绝望，最后连自身也仿佛失去这样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这样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残酷性的。

### 三、革命紧箍咒

但“革命”似乎还要显示自己的仁慈，宣布要给右派以“出路”，据说这就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凤鸣和她的丈夫是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的：“为了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我们在虚幻的梦境中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经历》，32~33页）

但这真是右派“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吗？

血的教训终于使和凤鸣们有了这样的觉醒：所谓“右派帽子”不过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四百年前的吴承恩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自由之身……（我）心中却十分凄楚，为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惨烈。唐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经历》，204页）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革命的紧箍咒”为什么能够对当年的右派发生作用？它又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

和凤鸣这样写到她拼命改造的心境与动力：“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竟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选择。”（《经历》，156页）

这“别无选择”四个字实在令人心酸。“革命”对这些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最



致命之处，不在惩罚落在他们自身——右派中并不乏能够承受苦难的硬汉，而且“一人做事一人担当”本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而现在却要把惩罚加之于孩子，特别是和风鸣、王景超这样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孩子更是无家可归，只能由年老病重的父母来承担本属于自己抚养的责任，而且按当时的血统论的“革命逻辑”，孩子也将和右派父母一样，成为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对象，葬送了一切前途：这样的惩罚才是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别是因自己而让无辜的孩子受苦，这更会引起无止尽的心灵的自责：“孩子啊，孩子，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经历》，35页）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也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而现在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却正是从这里捅刀，挥舞其“革命的惩罚之剑”，再硬的汉子也得屈服，并且承受永远除不去的罪恶感，真正“别无选择”。而对人的基本情感的这种蹂躏与利用，是残酷的。

和风鸣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记忆：一个右派，在极度的饥饿中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但他仍担心着妻子和儿女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了一首颂歌，表示在即将饿死时，仍然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希望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妻子和孩子们或许会好一些，这几乎是他惟一能为家人做的事了。和风鸣说：“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经历》，387页）使人感到对人的亲情的蹂躏与利用，不仅残酷，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更是“恶毒”与“阴险”的。

说到茨威格，我们又记起了前面讨论过的精神隔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精神隔离的严重后果，就是对人的自由思考、言说、交流的权利的剥夺，欲望的压制，造成人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而这样的虚无与空洞，正可以使“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和风鸣对这些被虚无化、空洞化的右派的精神状态与选择的描述，同样令人心酸：“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有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事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唯命是从，‘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瓜儿再去思考一番？”（《经历》，100~101页）这里所说的“绝对”响应与“绝对”服从，正是说明，当人陷入停止思考的虚无、空洞状态，就必然通向对专制强权的绝对顺从。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对人的本性或基本弱点的



利用：人是有一种“皈依”的内在欲求的，人对父母、故乡、大地……的迷恋，都是这一欲求的外在表现。而当人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如右派所处的这种绝对孤独的，几乎是绝缘（一切联系，一切缘分）的状态，这样的皈依的本能就会以一种畸形的，又是极其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刚刚被“革命权威”打入地狱，就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权威”所发动的将给自己与整个民族带来新的灾难的新运动中去：后来者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确实实地发生了。

这不仅是对人的本性、本能的利用，更有对革命者精神品格与气质的利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像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都是真诚的革命者。因此，当突然被自己以生命相许的“革命”打成“反革命”，他们就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即使烧成灰也不会反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绝对难以想象，“革命”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但他们又必须寻找某些说得过去的逻辑，来弥合这二者似乎是不可解的矛盾，勉强说服自己。和凤鸣在她的回忆中，这样谈到他们终于找到的逻辑：“当时无论他和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上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经历》，17页）。在为“反右运动”找到了合理性以后，自己犯了错误，也就顺理成章：至少是“客观上”帮了“葛佩琦之流”的忙了吧？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这竟是一个精心炮制的谎言：经过胡耀邦的亲自过问，现在已经查明，葛佩琦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这才成了“国民党上将”；而1957年的鸣放会上，他说的原话是：“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得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它。”但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变成了“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尽管葛佩琦立即去信指出这与事实不符，并声明自己的意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但《人民日报》却不加理会，反而变本加厉，连续发表工农兵及各界人士的文章”，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参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有理论根据的，即所谓“党性高于真实性”，为了“党的全局利益”，只要便于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采用，至于葛佩琦本人是



否受了冤屈,是否形成了对读者、群众的欺骗,都不在考虑之列。这背后,隐含着两个十分可怕的逻辑,一是“为了达到所谓‘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一是“为了所谓整体的、全局的利益,个人应作无条件的牺牲”。和风鸣、王景超和无数天真、善良的革命者、普通百姓,在1957年就是这样落入了按上述“革命逻辑”编织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的骗局中,和风鸣、王景超这些右派还成了所谓“革命全局”祭坛上的牺牲品。

和风鸣对当年接受改造的心理的描述、分析,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经历》,85页)“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本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乎获得了一些宁静。”(《经历》,343~344页)——这样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但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共同特征:将劳动和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着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现在,在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身上所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对专制的迫害的忍从的悲剧。从另一面说,那些“在劳动改造中求出路”的说教,就是对这些虔诚而幼稚的革命者的理想追求的蓄意践踏与利用,这是更令人憎恶的。

和风鸣关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给右派“摘帽”的回忆,让人觉得既荒诞又悲凉;消息公布时,人们当作“最大的喜讯”相互转告;接着是“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而“心慌意乱,坐卧不宁”——正如和风鸣所说,“我们这些被划为阶级敌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堕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要抢先抓到手手里争先活命”;在急切等待中终于到来的国庆“盛典”上,却宣布只给两人“摘帽”,而且依然在农场劳动,一切并无变化。

这绝不只是人性的残酷,这更是体制使然,或者说这是维护“革命地狱”的秩序



的需要。和凤鸣有这样的痛苦的自省：“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代发信件，我不是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内疚不已的事，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异化愈甚，堕落愈甚。”（《经历》，423页）本来，将一群异己者聚集在一起，尽管严加管制，对统治者也有不安全的方面：如果他们由于境遇与利益的相同联合反抗，就将破坏地狱秩序的稳定。而现在却用“改造好了可以摘帽”的诱惑，将这些右派分割成单独地为自己“早日摘帽”这一虚幻目标奋斗的个体，形不成共同利益与意志，自然也就无法产生群体的抗争；所形成的却是和凤鸣所说的“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的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行为准则”。而当每一个右派对同伴的苦难无动于衷，实际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同伴的迫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这样的参与，还会表现为主动的相互监督与告密。我们前面的分析中，谈到在劳改农场中普遍存在的右派间相互伤害，是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所致；而“摘帽”的“革命紧箍咒”则将这样的相互伤害注入利益的动机：对他人的伤害正是自己“赎罪”的表现，更是“立功受奖”的机会。如上文所说，所谓“摘帽”不过是一个大骗局，但它却成功地在右派中灌输了一个理性的观念：“为了自己活着，有一天能够摘帽，成为自由的公民，就必须不管他人死活，甚至要以他人的罪与死作为自己摘帽的筹码”，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正是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的要求使得人对于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理性让受害者丧失了人性和道德，让他们相互仇恨而不是仇恨迫害者，理性使他们争着想成为旁观者，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生存线上。”（于闾梅：《理性之下的杀与被杀——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文载《随笔》，2003年3期）这样，这些受害者（当然不是受害者全体，反抗者仍大有人在）既是被迫地，又是自觉地（出于解脱自己的理性考虑）参与了迫害，成为无所不在的控制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地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受害者理性地合作，这样的包括受害者自身在内的全民迫害，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罪恶之所在。

记得曾有朋友感叹中国没有“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但我读和凤鸣的回忆，特别是《地狱之行》那一章，却默默地对自己说：哦，我们有，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女人！写到这里，我的耳旁突然响起撕心裂肺的一声呼喊：“我还是一个女人！天哪，天哪！”这是在那个月夜，和凤鸣向着“深邃寥廓的夜空”从心底发出的泣血的悲鸣（《经历》，201页）。世上有谁知道，有



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的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经历》，200页）和凤鸣开始了她的“地狱之行”：“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见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但寡妇的悲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周围的人“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以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经历》，412~413页）。人的死亡因司空见惯而被冷漠待之，人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这近乎麻木的沉默，正是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和凤鸣说，这“冰冷”了她“悲伤的心”（《经历》，415页），因此，她真正放声一哭，却要等到三十年后，1991年8月她再次来到这里时，“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的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经历》，467~468页）。“不要阻止我的恸哭”，这一声呼号是惊心动魄的；在我看来，天下罪恶之大，莫过于禁止女人为自己蒙冤饿死的丈夫而哭泣。尽管本文中，一再使用“残酷”、“恐惧”这样的词语，——这是我读和凤鸣等人的著作最基本的感受，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几代人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现在，我仍然忍不住要说，宣布“悲痛有罪”，连哭泣的权利也要剥夺，因为表示一点对亲人惨死的哀痛，就要危及自己的，以及孩子的生存，这都是把人性的残酷发挥到了极致，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但同时，这也正是一种极度虚弱的表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哭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与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丈夫死了，妻子却活着。——我总觉得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更为坚韧。于是，中国的女人又有了“幸存者”的责任。和凤鸣的回忆中，多次使用“幸存者”这个词（《经历》，424页，458页，484页，488页，524页），她是深知“幸存者”这三个字的分量与责任的；牺牲者的生命及未及实现的生命理想，已经延伸到她的生命之中。但她更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





声”的（《经历》，424~425页），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尽管丈夫的离去，“没能扶我一把”，她生活得十分的艰难，多少次发出“我好苦、好累哟”的呻吟（《经历》463页），尽管她甚至感到多年来的挣扎，“重新铸造”了自己的性格，早已是“铁石心肠”，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经历》，465页），但她却永远不能把丈夫从她的生命中除去。她的景超留下了三样东西：“两套叠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他至死也期待着有一天“穿得体的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经历》，449页）；两本用他所特有的工整的笔迹写成的厚厚的日记——这是他生命的挣扎的忠实记录；还有他的对朋友，也是对妻子的最后嘱咐：“我出不去了”，“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一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写我们的“爱情”（《经历》，514页）。——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生命的，也是历史的命令。在“生死两茫茫”中，和凤鸣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丈夫，所有的死难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整整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她被梦魇般的记忆驱赶着，不停地写，“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她说，她要“把这一切如实的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的最大愿望。”（《经历》，518页）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2003年5月29日~6月4日



# 目 录

## 钱理群□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

### ——“1957年学”研究笔记之二(代序) / 001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 1. 获罪 / 001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

#### 2. 初到农场 / 028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